

# 经济周期与长期经济增长<sup>\*</sup>

——中国的经验和特点(1978—2018)

刘伟 蔡志洲

**摘要:**经济周期是经济增长中的各种矛盾在总量上的反映。在克服矛盾的同时总结历史经验、深化经济改革、改善宏观管理和调控,使我国实现了一轮又一轮经济发展水平上的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应对经济周期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提升的过程。在进入第四个经济周期之后,中国经济开始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化。目前各方面的调整已经比较充分,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从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重要发展机遇期,具备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能够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国也开始出现市场经济基础上由供需总量失衡所带来的经济周期。从主要宏观指标上看,尤其是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上看,可以分成四次大的周期。

**关键词:**经济增长 经济周期 全面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加速发展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总量失衡以及结构失衡,中国经济也经历着不断的起伏并反映出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变化突出的特征,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周期性波动,但也有各个阶段的特殊性,不同阶段的体制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外环境和发展目标的变化都会对经济周期的表现产生影响。研究这种周期性变动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对于我们判断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趋势,深化改革和改善宏观调控,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

从历史上看,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就成为一种周而复始的现象。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反映了经济增长中的供需失衡,形成对生产力的巨大浪费甚至是破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西方经济学家都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张宇,2009;王金明、高铁梅,2006),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进入20世纪后,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是两种的解决方案: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央计划经济,由此来解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所带来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失衡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学习前苏联建立了这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总量失衡长期表现为供给不足,而经济周期和危机是以供给过剩为特征的,所以在原来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确实很少见到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方面的矛盾,经济增长的效率不高,宏观经济失衡长期表现为短缺经济(科尔奈,1975)。这也是前苏联模式最后无法延续的基本原因。二是在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加强或改善政府干预,通过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反周期操作。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中形

<sup>\*</sup>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liu\_wei@ruc.edu.cn。蔡志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邮箱:caizhizhou@sina.com。感谢匿名评审人所提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成了以凯恩斯为先驱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1936),研究如何通过政府各种经济政策的适度干预,引导经济平稳增长。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学派(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他们的很多观点被政府采纳并加以实施。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周期反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会不断地经历复苏、高涨、衰退、萧条这四个阶段,但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反周期宏观干预的改善,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波动性已经明显减弱。以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等指标所反映的经济周期的波动程度也在减小,但经济周期始终存在。从实证研究上看,西方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周期已经有了很多探索,比较著名的有基钦存货变动周期(Kitchin,1923),周期的长度大约为3~5年;库兹涅茨基础设施投资周期(Kuznets,1930),周期的长度为15~25年;康德拉捷夫技术周期(Kondratieff & Stolper,1935),周期的长度为45~60年,等等。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周期的这些总结往往都是根据他们对一定时期的宏观数据的观察和分析得出的,由于时代在发展,很多传统的认识已经不能满足分析的需要。各个国家都在加强对于各种宏观数据的观察和分析,从而加深对于经济周期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政府宏观干预的水平。

表1列出的是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NBER)根据多个实际指标分析得出的对美国经济周期的判断,两个相邻的峰值或两个低谷构成一个周期。从表中可以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美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从峰值上看,周期最短的只有19个月(1980年1月—1981年7月),最长的为10年零8个月(1990年7月—2001年3月)。从周期持续时间上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较好,每一个周期都在10年左右;而进入新世纪后,高峰和低谷之间的时间开始缩短。从长期发展看,1980年到1981年之间的变化可以看作短期波动,中长期看大约是10年一个周期,2009年美国经济到达谷底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到目前为止,NBER还没有公布新的峰值(也就是说,目前的周期仍然进行中)。从表中还可以看到经济周期的一个特征,这就是相比较而言,经济周期中从高峰到低谷的时间远远短于由低谷到高峰的时间。从高峰到低谷往往只有几个月(最多的只有1年多),但由低谷到高峰往往会持续多年。这一方面说明当经济出现过热而达到峰值时,风险就已经开始加剧。这也是美国为什么特别重视对于经济增长中政府干预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对于经济增长的干预,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也使得近30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相对稳健。

表1 1980—2009年美国波动情况

转折日期	高峰或低谷	相邻高峰或低谷之间时间长度	峰谷之间的时间间隔	公布日期
1980年1月	峰			1980年6月3日
1980年7月	谷		6个月	1981年7月8日
1981年7月	峰	1年零6个月	1年	1982年1月6日
1982年11月	谷	2年零4个月	1年零4个月	1983年7月8日
1990年7月	峰	9年	7年零8个月	1991年4月25日
1991年3月	谷	9年零8个月	8个月	1992年12月22日
2001年3月	峰	10年零8个月	10年	2001年11月26日
2001年11月	谷	10年零8个月	8个月	2003年7月17日
2007年12月	峰	6年零9个月	6年零1个月	2008年12月1日
2009年6月	谷	7年零7个月	1年零6个月	2010年9月20日

注:资料来源于“US business cycle expansions and contractions”,<https://www.nber.org/cycles.html>。

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当时的苏联模式建立了中央计划经济,在一定的时期内,这一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积极意义,尤其是通过在国民收入中的高积累来扩大投资,由此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这一模式下也存在着内生动力不足和外生干扰较多的问题,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经济活动的效率难以持续提高,外生干扰较多则反映为正常的经济运行时常因为非经济原因而发生问题,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起伏和停滞。从总体上看,正像苏联和其他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一样,当时中国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上也是长期供给不足,消费品不足迫使必须通过票证经济来安排消费,投资品的不足导致以“排队”计划等待的

方式来安排投资需求,所以不存在市场经济国家以“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循环出现为特征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推进市场化改革<sup>①</sup>,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刘伟,2009),这样,在市场经济下的供求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总量失衡就有可能周而复始地出现,这就使得中国也开始出现经济周期(从宏观指标上看,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指标的周期性波动)。尽管引起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都是市场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但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是逐步推进的,各个时期的市场化程度不同,引发经济周期的具体原因、经济周期的表现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反周期的措施也不同。同时,由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不同,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的深层原因也存在本质区别,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周期又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周期及其表现

### (一) 总量变化

经济周期首先是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变化来观察的。表2列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8年)中国GDP指数的变化情况。为观察经济增长率围绕着均值所发生的波动,表中列出的平均GDP指数是以算术平均数计算的(109.5,如果以几何平均数计算为109.2),标准差为2.71%,和均值相比数值较小,说明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后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平稳的。如果以均值加上或减去一个标准差为标准所得到的区间为(106.8,112.2),在这个区间里经济增长属于正常波动,否则属于发生了经济过热或过冷。在表2中,低于106.8的年份有5个,分别为1981年(105.1)、1989年(104.2)、1990年(103.9)、2016年(106.7)、2018年(106.6);高于112.2的年份有7个,分别1984年(115.2)、1985年(113.4)、1992年(114.2)、1993年(113.9)、1994年(113)、2006年(112.7)、2007年(114.2),属于经济过热。中国的经济过热一般不会持续很久,会很快出现峰值,然后出现增长率的持续回落,即进入经济调整期。这一点和美国不同。在表1中可以看到,美国经济出现峰值后,会迅速回落,然后再缓慢上升;而中国可能是缓慢回落,再迅速上升。反过来,经济过冷通常也不会持续很久,调整到一定点也会出现反转。虽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处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时期,但从长期趋势看,增长率也不会潜在增长率区间外长期停留,否则可能是出现了系统性的变化。

表2 1979—2018年中国GDP指数情况(上年=100)

年份	GDP 指数	年份	GDP 指数	年份	GDP 指数
1979	107.5	1993	113.9	2007	114.2
1980	107.8	1994	113.0	2008	109.7
1981	105.1	1995	111.0	2009	109.4
1982	109.0	1996	109.9	2010	110.6
1983	110.8	1997	109.2	2011	109.5
1984	115.2	1998	107.8	2012	107.9
1985	113.4	1999	107.7	2013	107.8
1986	108.9	2000	108.5	2014	107.3
1987	111.7	2001	108.3	2015	106.9
1988	111.2	2002	109.1	2016	106.7
1989	104.2	2003	110.0	2017	106.9
1990	103.9	2004	110.1	2018	106.6
1991	109.3	2005	111.4	算术平均数	109.5
1992	114.2	2006	112.7	标准差	2.71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2018年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

<sup>①</sup>虽然党的十四大才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在实际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化改革就已经开始了。

从图 2 可以直观地看出中国在过去 40 年经济增长率(GDP 指数减去 100)的波动情况,可以把增长率的波动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短期波动,即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改变方向然后又持续原来的趋势;另一种是趋势性波动,即经济增长率发生持续的增长或回落。从图中可以看到,1981 年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回落,但随后继续保持了原先的上涨趋势,属于短期波动,1987 年的上涨则属于短期上涨,然后又延续了原来的回落趋势,2011 年的上涨从短期看属于回升,但是从长期趋势看属于回落过程中的波动。从长期趋势的观点来看峰值,在过去的 40 年间,经济周期的峰值出现过三次,分别在 1984 年、1992 年和 2007 年。而从谷底看,则出现了四次,分别为 1981 年、1990 年、1999 年和 2018 年。如果把相邻两次谷底之间所经历的时期看成一个经济周期,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三次经济周期。前两次周期之间约为 10 年,第三次周期约为 20 年。问题在于,2009 年到 2010 年的这一次波动,究竟反映的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如果把 2008 年和 2009 年也看成一次谷底,把 2010 年则看成达到一次峰值,那么我们就经历了四次周期,每次经济周期的时长大约是 10 年。关于这一点,还要结合对通货膨胀的观察加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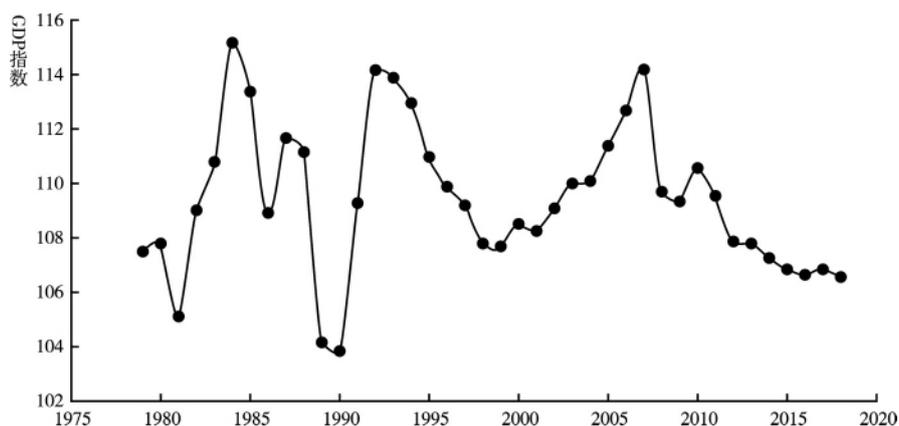


图 1 1978—2018 年中国 GDP 指数(上年=100)

## (二)对通货膨胀的观察

在世界各国,通货膨胀或紧缩首先是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所反映的。在欧美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往往把每年 2%~3% 的 CPI 上涨幅度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低于这个标准往往被认为出现通货紧缩,而高于这个标准则被认为可能是出现了通货膨胀。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上看,这个经验数值有其合理性,如果 CPI 保持在这个区间内,经济增长往往能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sup>①</sup>。但是就中国而言,由于在改革开放之前,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是政府管制的,改革开放之后开始逐步放开物价,这就使得中国的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有一些自己的特征:

首先是价格总水平的波动也呈现出周期性的状态。从表 3 的数字中可以看到,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经历了剧烈的起伏,虽然从 90 年代后期开始相对平稳,但总的均值和标准差都相对较高。从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的关系看,峰值有 4 个,分别在 1988 年(118.8),1994 年(124.1),2008 年(105.9)和 2011 年(105.4),谷底也有 4 个,分别在 1979 年(101.9),1990 年(103.1),1999 年(98.6),2009 年(99.3)和 2015 年(101.4)。从相邻两个谷底之间的关系看,改革开放后我们大约经历了 5 个周期,大约是每 10 年一个周期。2015 年的 CPI 为 2009 年后的最低值,2016—2018 年有一点提升,但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其次是价格总水平的波动逐步趋于平稳。从图 2 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以进入 21 世纪前后为界,中国价格总水平的波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 1978—1999 年期间,价格总水平波动的幅度较大,远

<sup>①</sup>通过对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NBER)发布的 GDP 时间序列数据和劳工统计局(BLS)的 CPI 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比较,可以明显看出这种观点是有现实依据的。

远超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标准,有5个年份的CPI都在110以上,但是在2000年之后,仅有两个年份的上涨幅度超过了5%,波动程度仅仅是略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这种波动程度也是正常的。

表3 1979—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年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年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年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979	101.9	1993	114.7	2007	104.8
1980	107.5	1994	124.1	2008	105.9
1981	102.5	1995	117.1	2009	99.3
1982	101.9	1996	108.3	2010	103.3
1983	102.0	1997	102.8	2011	105.4
1984	102.7	1998	99.2	2012	102.6
1985	109.3	1999	98.6	2013	102.6
1986	106.5	2000	100.4	2014	102.0
1987	107.3	2001	100.7	2015	101.4
1988	118.8	2002	99.2	2016	102.0
1989	118.0	2003	101.2	2017	101.6
1990	103.1	2004	103.9	2018	102.1
1991	103.4	2005	101.8	算术平均数	104.9
1992	106.4	2006	101.5	标准差	5.9

注:资料来源于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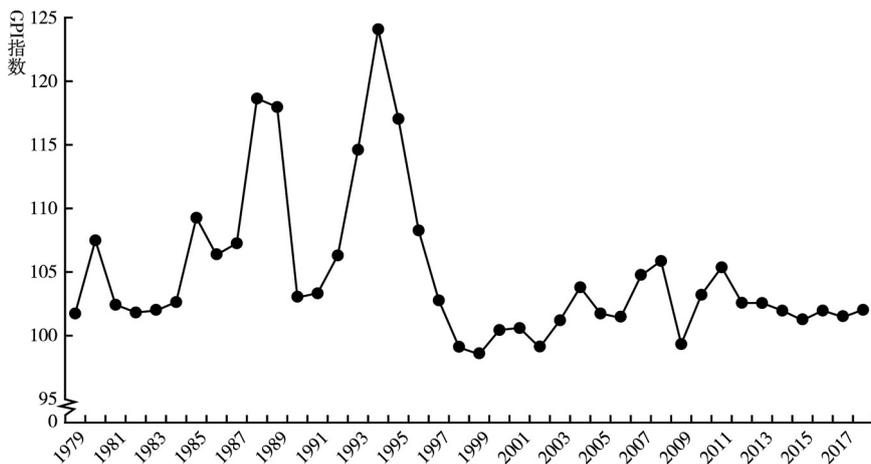


图2 1978—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国正处于由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过程中。在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和市场供求严重脱节,即商品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相当严重,价格总水平的较大幅度上升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但是CPI的波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中的总量失衡。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国有企业对市场认识不足,对价格信号反应不敏锐,价格信号本身也发生扭曲,而国有银行贷款和财政拨款支持下的过度投资由供给不足迅速转为需求不足,从而导致CPI的巨大波动。虽然形成通货膨胀的生产主体和融资方式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但就企业和政府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对市场认识存在着不足,必须通过市场本身的调节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言,则有相似之处。因此,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且推动和深化了以产权制度改革和竞争性价格机制改

革为基础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要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实现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加强企业的自我约束和风险控制能力,以保持经济活动的平稳运行。这就使得在世纪之交,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主体作用,但无论从其规模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是从其在竞争性行业中所发挥的作用上看,都比过去大大缩小了,而民营经济则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期。各级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也逐渐从原来的行政上下级关系转变为市场性的横向关系。相应地,政府鼓励经济发展或防止经济过热的手段也有了很大变化,国家更加重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运行和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价格总水平的波动尤其是消费价格总水平的波动比前20年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

第三,从消费价格和投资价格的关系看,投资品价格对于价格总水平的影响逐步加大。在世界各国,CPI都是反映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虽然CPI只反映了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变动,但在比较充分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消费价格和投资价格是联动的,观察CPI就能够了解市场价格总水平的变化。但是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积累和投资在高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生产者价格与消费者价格的变动仍然存在着差别。可以通过观察GDP平减指数<sup>①</sup>与CPI之间的关系,看投资品价格的变动对于价格总水平的影响。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1999年以前,中国CPI的波动程度大于GDP平减指数,而在此之后则小于GDP平减指数,这说明投资品价格波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在扩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8年住宅商品化改革之后,作为投资品的居民住宅的价格水平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房价上升的幅度比较大,对GDP平减指数产生了影响。可以在图中看到,2004年、2007年、2008年及2010年、2011年的上涨幅度都超过了7%,都发出了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信号。但是就CPI而言,这一期间涨幅超过5%的年份只有两个,分别为2008年和2011年。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开始把控制房价过度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正是因为投资品价格尤其是房价的变动已经成为全部商品的价格总水平的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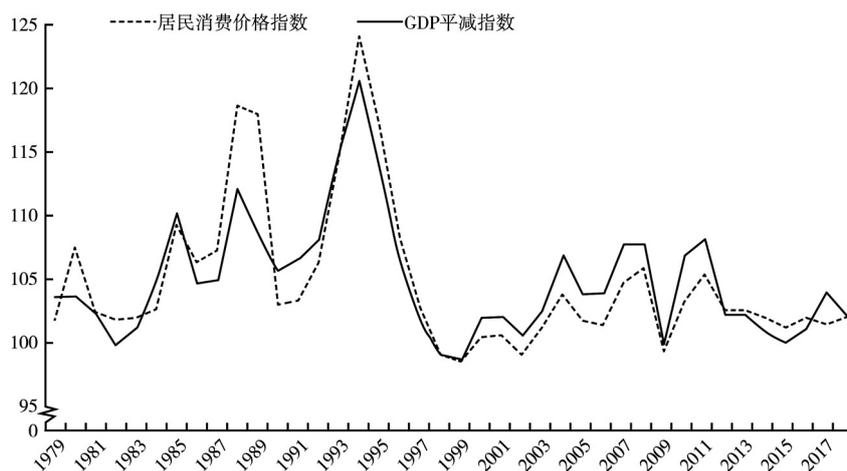


图3 1978—2018年CPI与GDP平减指数的比较

注:GDP平减指数通过《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现价GDP数值和GDP指数推算。

第四,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中国目前正处于第四个经济增长周期的底部。图4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与以CPI为代表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即在经济增长率提升的时期,通货膨胀率也在提升,反之亦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峰值领先于通货膨胀的峰值,所以经济增长率回落,而通货膨胀率却仍在上升,往往就是周期性峰值出现的信号,或者说是经济增长出现转折的信号。在2008年,中国的

<sup>①</sup>GDP平减指数(GDP Deflator)=GDP名义指数(用现行价格计算)/GDP指数(用固定价格指数)。

经济增长率相对于上一年的过快上涨(2007年增长率超过14%)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但通货膨胀率则在继续提升,这是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改革开放前20年相比较)经济周期出现峰值的信号,总量失衡的方向将发生改变,一个经济周期即将结束。但是在2008—2009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所遇到的问题有其特殊性,这就是经济周期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叠加,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特别严重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重刺激的方式(双松)来遏制经济增长率回落,取得了明显的短期效果。具体表现为,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重新回升,达到阶段性高点(10.6%),而表现在CPI上则是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的回升,在2011年到达高点(5.4%)。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的强刺激政策,事实上把下一个周期的峰值提前了,但由于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各种矛盾所引起的总量失衡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或有效缓解,经济调整仍然要延续,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和CPI的双重回落。因此,可以把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二个20年这个大周期进一步细分,分为两个周期,即1998—2008年前后为一个周期,2009—2018年前后为另一个周期。也就是说,按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波动情况来看,可以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波动分为四个周期,大约每10年一个经济周期。而目前正处于第二个20年的第二个周期(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第四个周期)的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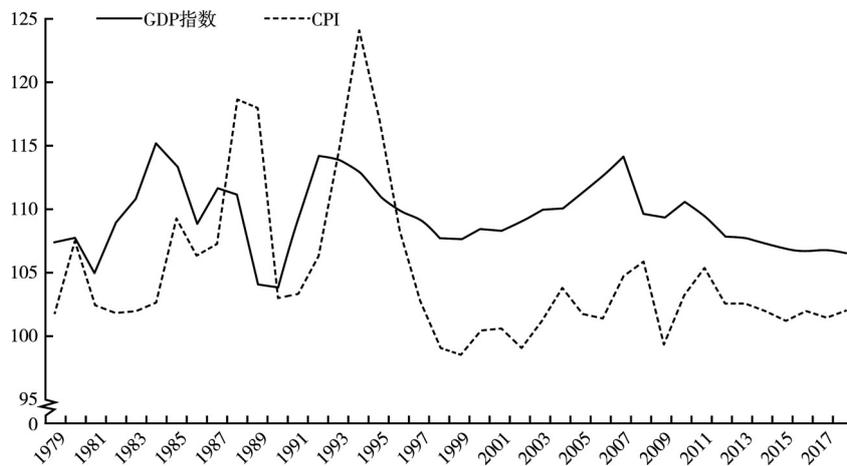


图4 1978—2018年GDP指数与CPI的比较

### 三、从经济体制和三大总量的变化看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特点

经济增长周期是一种宏观现象,反映的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反复的由相对均衡到失衡、再走向相对均衡的过程。平衡或者是均衡不是目标,而是保证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手段。发展可能打破原有的均衡,从而引起新的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化改革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出发点就是为了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这种效率提升至少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要提高产出时间效率,就是要在单位时间(如一年)中实现更多的产出;第二是提高要素效率即投入产出效率,就是在同等的要素投入情况下要获得更大的产出;第三是这种效率的提高必须是稳定的、可持续的,要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和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的无效生产活动。这样的效率提升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好的、符合本国特点的、不断发展完善的现代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仍然处于计划经济阶段,推动经济发展首先是要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后通过探索性的市场化改革(如工资制度的改革、消费品价格的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等)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尤其是劳动者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企业和市场的关系等),由此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实现加速推动经济增长。这一时期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仍然属于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关系。一方面,由于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由于“预算软约束”,公有制企业在扩大投资时缺乏

风险意识和风险控制;再加上价格体制改革导致的消费品价格的较大波动,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快速提升之后不得不进入调整,这就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经济周期。在第一个经济周期中虽然进行了各种经济改革尤其是强调了收入分配改革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但仍然是计划经济框架下进行改革,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生产者的积极性也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进入第二个经济周期后,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虽然从整体上看这一阶段的年均增长率比较高,但由于价格体制的改革已经从消费品扩大到了生产资料,通货膨胀的程度也很高,在转轨过程中又有许多企业适应不了市场变化的要求而关停并转,这一时期的高增长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一周期中后期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包括产权、商品、劳动、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为未来的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基础,在相对更加充分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无论是企业和居民家庭自身的风险意识,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都比过去大大提高了。这就提高了未来的经济增长效率。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也有了改变,由原来的直接对企业进行行政管理改变为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实施宏观调控。从2003年中国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后,政府就开始不断通过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操作抑制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应该说这些措施是有成效的。尤其是在2007年,早在全球金融危机来临之前,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了各种反通胀措施,就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国际环境的恶化对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从图5中可以看到,1998年之后也就是进入第三个经济发展周期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变动虽然也有波折,但是从总体上看波动程度已经大幅度缩小,经济增长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区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及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也没有再发生。这说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市场化改革不但有利于提高中国的经济效率,也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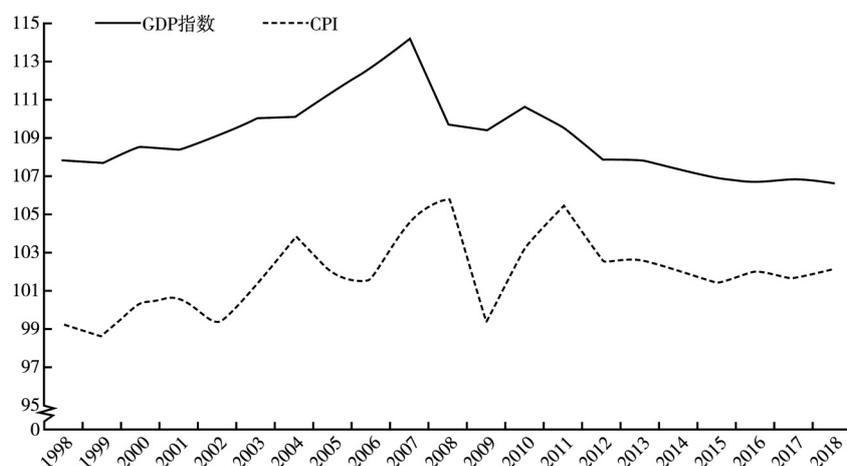


图5 1998—2018年GDP指数与CPI的比较

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都是在动态中进行的,一个竞争性的、不断改革的体制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效率。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部门、金融机构、居民家庭(住户)部门、政府等市场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由总量的周期性失衡带来经济波动仍然是会发生的,好的体制、制度和宏观调控能够减轻或缓解而不会消除这种波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波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市场自我调节在经济增长上的一种反映,但如果超出一定限度,就会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带来冲击。从需求方看,经济增长主要反映为三大总量的增长,即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大经济总量的增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不同方面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

#### (一)消费升级

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消费拉动的。由于分工的细化和升级,生产过程中的产业链会更长,生产的中间部门会更多,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也可能会更多,但是从最终结果看,这些投

资的意义必须使社会最终消费(包括政府和居民的最终消费)有所提升(包括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投资。还有一种投资是居民家庭对于住宅的购买,从居民家庭购买住宅这种行为上看,由于住宅可以多年使用而且价格较高,在统计或国民经济核算上它属于投资行为,但是从对住宅的使用上看,它也属于一种最终消费,所以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居民家庭的自有房屋要计算“估算的房租支出”,并计入居民最终消费中。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居民消费经历了不断的升级,每一次的消费升级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消费升级之后的总量失衡又都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成为形成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一个经济周期中体现为从传统的“老三件”(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升级为新三件(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第二个经济周期中,电话、空调、摩托车、电脑等新的耐用消费品开始大规模进入居民家庭;第三个经济周期中,消费升级主要体现在家用汽车和居民住宅的需求上;第四个经济周期中,则是希望通过房地产业的发展来扩大需求。每一轮消费升级之初,都有一类或几类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迅速扩张,导致供给不足和价格上涨,并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在每个周期中,消费升级和经济扩张的关系都是很明显的,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扩大投资,在开始都有很好的收获,但是到了后期,许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往往会过度乐观,从而出现过度融资和过度投资,最后出现产能过剩,导致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使经济增长放缓。从而形成一个经济周期。应该说,各个时期的产能过剩有其不同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前期,在计划经济主导下,企业缺乏风险控制意识,每一轮产能过剩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较大;而到了后期,政府和企业的风险防范的意识都有所增加,产能过剩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击较小。但也要看到,现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每一个百分点的波动包含的绝对量已经非常大,怎样满足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而又不出现供给过热,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

从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上看,这些消费水平的升级实际上是从需求方反映着中国经济“赶超”或者是现代化的进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普通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和西方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中国的“老三件”仍然紧缺,西方国家早已经普及了汽车;中国的居民住房仍然属于“蜗居”时代,西方国家的一般家庭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住房问题。所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就是适度地放缓生产性投资来改善人民生活,让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再由消费来带动投资,从而实现加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大约也是每十年上一个台阶,除了显著缩小了在传统消费领域(电视、冰箱、汽车、住房等)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外,在新兴消费领域中(电脑、通信、互联网、智能手机等)则几乎是和发达国家同步发展的。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和发达国家消费内容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有些方面我们甚至还走到了世界前列(如智能手机的发展及其应用),由爆发性的消费升级而大幅度带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虽然无论从抽水马桶、空调等家居设备,还是交通、居住、周边环境等生活条件以及在外就餐、旅游、教育、医疗等方面,居民的消费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是这种改善已经从局部改善发展成为全面性的改善,仅仅靠某一类消费品或者服务的大规模提升和普及来带动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需要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全方位地得到提升。这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就的体现,另一方面则对下一阶段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提出了挑战。

## (二)投资拉动

在支出法GDP中,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是国内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投资不仅反映着需求(对于投资品的购买形成了需求拉动),同时改变着供给(资本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格局形成重要影响)。而国民收入在各个机构部门(政府、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居民部门等)之间及其内部的分配和再分配,则对投资产生重大的影响。早在改革开放以前,如何处理国民收入使用中的积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就一直是经济学界和政府高度关心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通过增加积累、扩大投资来改善经济增长,才可能在这一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但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通过人民群众长期节衣缩食而增加的积累所进行的投资,往往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重视了改善民生,由消费带动的投资往往更加有效率。与此同

时,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对市场预期和实际发展上的差距,投资不足及过度投资的交替循环,往往是加剧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图6列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后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总需求比重<sup>①</sup>的变化情况,当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下降时,说明消费的增长率高于投资,反之,则说明投资的增长率高于消费。如果把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视为增长的一般水平,那么投资比重下降,说明投资的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反之则高于经济增长。我们过去所做的分析中,经常侧重于对投资增长本身的分析(刘伟、蔡志洲,2009)。而本文主要通过投资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变化看不同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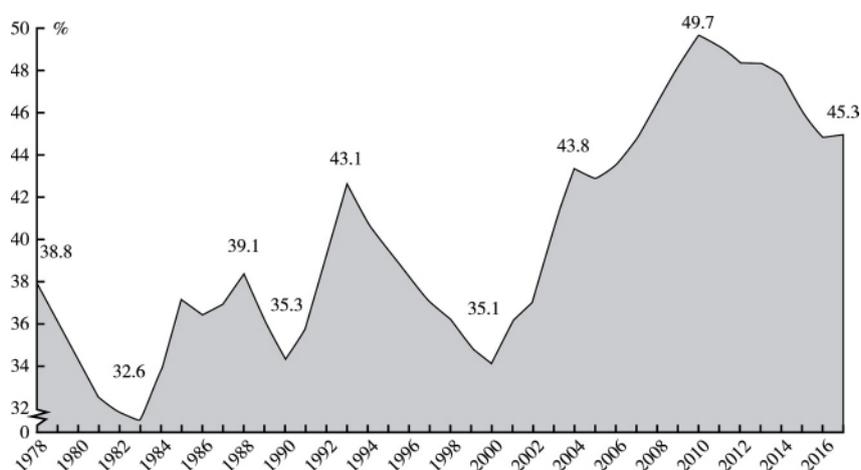


图6 1978—2017年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总需求的比重

从图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投资比重首先是下降的,从39%下降到1983年的33%。这是对改革开放之前的高投资的一种修正,这种修正反而带来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加速增长。这说明并不一定是投资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投资还需要和其他方面的发展相协调,才可能获得更高的效率。在1983年前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之后,在投资比重变化的过程中,比较而言,较大的峰值有三个,分别出现于1988年(39.1%)、1993年(43.1%)和2010年(49.7%);较明显的谷底有4个,分别出现于1983年(32.6%)、1990年(35.3%)、2000年(35.1%)和2016年(45.3%)。对比图1可以看出,在2000年以前,投资比重的峰谷和经济增长的峰谷的时点通常是较为接近的。但自2000年以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起伏已经不同步。200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明显回落,但投资比重仍然在继续上升,一直持续到2010年,此时,投资占国内总需求的比重已经接近50%,创改革开放后最高,也为世界各国所少见。

改革开放后投资比重(或称为投资率)的变化,既受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也有发展阶段上的原因。从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上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般地说,由于投资弹性和消费刚性,投资增长或回落的波动程度要高于消费。投资弹性较大的原因在于投资支出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和政府,资金来源于企业自有资金、政府财政收入、金融机构融资,企业自有资金所占的比重通常较小,通常需要借助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力量来扩大投资。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所占的比重在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中最大的原因(2017年的比重为21.7%),因为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能够得到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更大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每当政府要通过扩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时,国有(或国营)企业往往会迅速组织资金加大投资,带动新一轮投资高涨,然后就会出现产能相对过剩和投资回落。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经济周期中,这样的循环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国有或国

<sup>①</sup>将支出法GDP中的最终消费支出加上资本形成总额,就是这里说的国内总需求。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反映的是国民收入使用中的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库存变动)反映的是国民收入使用中的投资。由于通过计算得到的是相对数(%),这实际上已经消除了价格变动的影响。

有经济占绝大比重的情况下,对投资预算又缺乏必要的风险控制机制(即预算软约束),必然会出现较多盲目或低效率的投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尤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的发展,市场自身调节的能力和政府宏观调控水平都在提升,全社会总体的投资风险是下降的。从图6中可以看到,自2000年以来,投资率的持续上升连续保持了10年,但没有出现以往那种断崖式的下跌。一方面,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 and 居民部门的发展,社会的风险控制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2000年以后中国的投资率不断上升,还有其特殊的发展阶段上的原因。一是在1998年6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的建设成为经济建设的重点,在过去的20年中,基础设施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中国“赶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抓住有利时期,在基础设施上率先实现赶超,未来的全面“赶超”或者是现代化就会受到影响。当然,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一部分可能短期效益不高,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也影响了人民群众的一些当前利益,但是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大规模投资极大地缓解了生产能力的瓶颈,21世纪初的“煤电油运”紧张的局面已经根本扭转。二是住宅商品化改革带动了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近20年来,中国居民的居住条件有了根本的改善,这其中既包含有还历史旧账的因素,也包含有超前消费的因素,这种改善的主要力量,在于居民家庭部门(住户)的大规模的住宅投资。住宅商品化改革后,全社会住宅投资迅速提升,推高了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曾提高到20%以上)。而近些年的投资率回落,也和全社会住宅总额增长放缓有很大关系,2014年全社会住宅投资总额突破8万亿元后,连续4年没有增长<sup>①</sup>。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及基础设施投资、住宅投资等由迅速高涨转为平稳发展,中国的投资率也会逐渐回落。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带动了大量的投资需求。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抓住有利时期,促进出口产业的发展,2002—2007年,中国的货物出口增长率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按现行价格计算,其中2003年和2004年在30%以上)。2000年,中国的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为3.9%,在全球排名第七,而到了2010年,中国出口在全球所占的份额已经提高到10.4%,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sup>②</sup>。迅速增长的出口不但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因此,从第三个经济周期开始,中国投资率的较大提升是有其特定的背景的。

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第四个经济周期后,为了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又采取了进一步刺激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加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因为从宏观上看,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提高投资的比重,那么投资所形成的很多生产能力在中近期将不能被消化,没有收益或者是负收益。这时,仍然以扩大投入尤其以投资作为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手段已经不可行,将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金融风险 and 产能过剩的风险。所以从2010年开始,由于各种客观的和宏观政策的原因,中国的投资率开始不断下降,这个趋势已经延续了10年。就数值上看,目前45%左右的投资率与世界各国比较仍然不算低,但是就动态发展趋势上看,投资增长率持续地、长期地低于经济增长率也会带来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的问题,因此,近两年来投资率下降的现象又出现了减缓(参见图6)。这说明中国经过“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等措施,在第四个经济周期中对“投资过热”的中期调整已经比较有效。

### (三) 出口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目前公布的支出法GDP中,主要包括三大总量,即居民最终消费总额、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出口—进口)。净出口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收支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生产概念,净出口中的出口中包含的货物和服务虽然是由

<sup>①</sup>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8》。

<sup>②</sup>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资料分析计算。

外国消费和使用的,却是由中国通过利用自身的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增加值,为就业提供了工作岗位,因此它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进口则是对国外货物和服务的使用,这些货物和服务可以用于最终使用,也可以用于中间消耗。由于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实际上不是收支相等而是略有盈余,生产进口替代产品上的能力又在不断提升,刚性进口产品(如石油、大豆等)有限,政府在不同年份可能因为外汇结存情况的变化而调节进口。所以,中国的进口实际上是受出口制约的。外向型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应该从出口方进行观察。图7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货物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以下称为出口依存度)的波动<sup>①</sup>。由于货物出口和GDP总额都是由现行价格计算的,由此计算的比值已经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即出口依存度增加,意味着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反之则低于经济增长率。

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的出口依存度的变化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1978—2006年是第一个阶段,出口依存度是逐渐上升的(中间有小的波动);2006—2018年为第二个阶段,出口依存度是逐渐回落的。换句话说,在第一个阶段,外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步扩大的,而到了第二个阶段则在逐步缩小,出口虽然也在增长,但相对经济增长而言较慢<sup>②</sup>。如果没有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并由此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增长放缓,那么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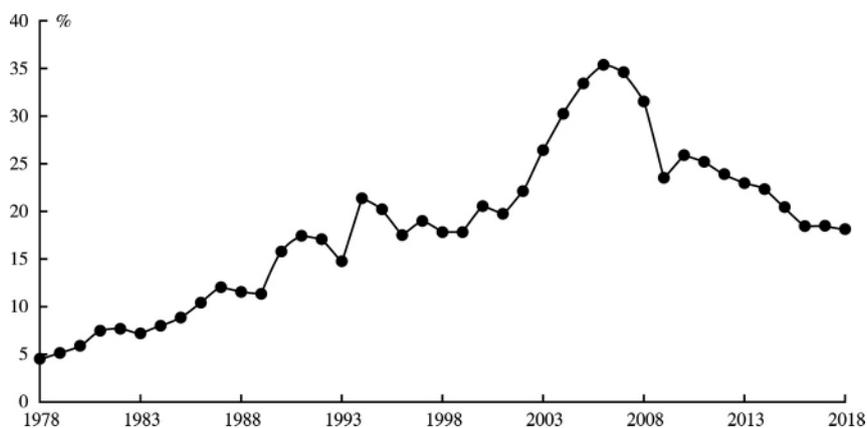


图7 1978—2018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占现价GDP的比重(出口依存度)变化

注:表中货物出口额及GDP均以人民币按现行价格计算。

再具体细分,1978—1994年是中国出口依存度的第一个快速增长阶段,出口依存度由5%提升到20%以上。这一时期是中国实施赶超战略的起步期,为了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需要大量的外汇,这一时期的出口主要是为创汇服务的,出口企业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当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十分有限,这种以创汇为目的的生产为当时的经济建设做了很大的贡献。中国当时的外向型发展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依赖性不大,在国内,出口企业有国家支持,成本控制的压力较低,在国际上由于市场占有率很低,仍然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因此,第一个经济周期后期(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经济波动对出口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出口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从图6中可以看出,1994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突破20%达到阶段性高点后,从1995年开始回落,1996—1999年这四年间都保持在20%以下,2000年才再次突破20%。这一期间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外部环境的变化冲击了出口,再加上国内的经济调整,出口和经济增长双双放缓。这

<sup>①</sup>在国民经济核算尤其是GDP核算中,“进口”或“出口”一般指的是货物和服务的进口或出口,2017年,中国“货物和服务的出口”为2.42万亿美元,其中货物的出口为2.22万亿美元,服务的出口为0.2万亿美元,货物出口的比重在90%以上,选取货物的出口来反映整个出口的变化趋势是有代表性的。

<sup>②</sup>按现行价格计算,中国2018年的GDP是2006年的4.1倍,但货物出口仅仅为2.1倍。

说明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出口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加大。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中国的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从图6中可以看到,2001—2006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由20%上升到35%,提高了15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断增大,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风险。这就是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的风险在增大,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就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的冲击。同时,出口增加过快对国内自然资源、环境等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从2007年开始,中国的出口增速就开始放缓,出口增长低于经济增长。2009年更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2010年后,出口依存度曾经出现短期的回升,但在此之后一直在持续下降,现在已经回落到20%以下。这说明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确实影响了中国出口的增长,这也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率回落的重要外部因素。2015年后,出口依存度稳定了下来,保持在18%左右,出口和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保持了同步。

从整体上看,对外开放40年来,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在不断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这标志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把握住了机会,不但发展了自己的经济,也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仍然还有很大的潜力,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还有很大的潜力,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但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是在只占世界贸易的很小份额的基础上扩大对外贸易,而现在则是作为最大的对外贸易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包括出口、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发展的难度和不确定性都在加大,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以及对华政策变化,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值得重视。

#### (四)小结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经济周期也是总量失衡的结果,表现为经济增长率与价格总水平上涨程度的波动。事实上,在计划经济下这种失衡也是存在的,只不过由于实施了市场管制和票证经济,总量短缺(尤其表现在消费领域)和总量过剩(尤其反映在投资领域)不会在价格总水平的波动中反映出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其他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短缺和过剩会明显地通过价格信号表现出来。但是,中国的经济周期也有其特殊性。

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经济体制长期的、逐渐的变迁中实现的,而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经济增长的市场和制度基础是相对稳定的。

第二,从消费拉动上看,中国的消费升级是在“赶超”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台阶逐步实现的,每上一级台阶基本上就伴随着一个经济周期。而在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近几十年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井喷”现象。

第三,从投资拉动上看,高投资在中国过去的高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在世界各国是少见的。日本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投资率最高的1970年也仅仅达到39%<sup>①</sup>。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投资率超过40%的年份有19个,在2003年再次突破40%之后,长期保持在这个数值之上。从需求上看,前面已经分析过,中国的高投资有其重要的发展原因。而从资金来源上看,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居民家庭的储蓄倾向历来较高,再加上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在低收入居民收入和消费不足的同时,高收入家庭将大量收入转为储蓄,形成全社会的高储蓄(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显著高于世界),又通过金融机构和政府将这些储蓄转为高投资。

第四,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上看,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欧盟等)全球化的程度很早就已经相当高,因此它们的经济周期经常是和全球经济波动同步的,但中国在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

<sup>①</sup>参见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8)》,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长过程中,是逐步加入全球化体系之中的,因此中国的经济周期,开始时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内部因素,而到了后来,外部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五,中国的经济波动是在高速经济增长中发生的,而同期发达国家大多早已完成工业化,其经济周期是在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上出现的,因此波动的幅度也比较小。从整体上看,随着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就经济总量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在逐渐减少,共性有所增加。这就是在总需求上,内需和外需的结构短期可能会发生一定的波动,就长期而言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这是因为外需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在内外交流中获得比较利益,从而满足不断增长的内需。而在内需方面,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短期可能有所波动,但长期而言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这是因为就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看,投资归根结底也是为消费服务的,是放弃一部分当前的消费来获得未来更多的消费。如果为投资而投资或为增长率而投资,不能为社会带来福利或者说只带来了低效率,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的效率就可能不断降低。从图6和图7中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尤其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的增速低于GDP的增速(表现为出口依存度不断降低),投资增速低于消费增速(表现为投资率不断降低),这和第三个经济周期的长期走势是反过来的。因此,在第四个经济周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价格指数长期处于改革开放以来较低水平,从总量平衡来看,仍然是需求不足,也就是消费需求的增加不足以弥补由于出口和投资增长率回落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回落。

#### 四、中国经济发展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而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切实引领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切实实现质量转变、结构转变、动能转变,这为中国经济增长提出了新的思路。首先是要真正处理好经济增长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同时,在经济增长中,要真正改变主要是通过扩大投入(尤其是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要更多地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率来获得更多的产出。在这一转变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可能放缓,以往的10%左右的年均GDP增长率很可能将不再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较快的经济增长。无论是从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看,还是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看,都离不开较快的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17年中国按汇率法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8690美元,在列入统计的191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71位,比21世纪初100位以外有了显著的提升<sup>①</sup>,但是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412美元)。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上看,2017年美国、日本和韩国的人均GNI分别为59160美元(第8位)、38520美元(第24位)和28380美元(第31位),而高收入国家<sup>②</sup>的平均水平为40404美元。中国2018年的人均GNI已经接近10000美元,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6%以上),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就能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0412美元)。在此之后,再用3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就能迈过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分组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中的一员。这说明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为人口优势,经济总量也已经到达世界前沿,把这个成就称为“中国奇迹”一点都不为过。但要是从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上看,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仍然还有很大差距,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即再用15年的时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此后,再用15年的时间,到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经济增长率上看,上一个经济周期(2009—2018年)属于高速经济增长后期,已经由高速经济增长向中高速经济增长过渡。那么,这样的中高速经济增长能否保持下去?显然,如果没有适度的

<sup>①</su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16800国际元,在列入统计的189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78位。

<sup>②</sup>人均GNI大约在12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经济增长,全面现代化目标将很难实现。现阶段虽然对经济增长预期进行了调整(从原来的至少9%下调到6%左右),但这在世界上仍然属于较快的经济增长。在过去30年里,能在发展水平到达一定高度后,再把5%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到30年以上的,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即韩国和新加坡<sup>①</sup>。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需求上看,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要求都在创造着大量的需求;而从供给上看,无论是从资源(自然和人力资源)禀赋上看,还是从生产要素的发展优势上看,提高生产力的潜力都是巨大的。作为一个大国具有的国内市场优势,为中国避免国际环境的变化造成的冲击提供了回旋余地,关键还是我国是否能够不断通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来保持发展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从世界各国的经济看,一个国家到达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影响一个国家能否继续取得好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治和社会因素,一个动荡的、政治纷争不断的国家是很难实现稳定的经济发展;二是经济体制因素,经济体制能不能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又不断改善社会公平;三是技术创新,如果只是不断扩大投入而缺乏技术进步,企业在国内外就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发展优势;四是对国际环境的依赖,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对国际环境过度依赖,那么发展的自主权就不在自己手上,不但容易受到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更容易在发展中受制于人。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政治上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安定,经济上有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活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正在不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外向型经济虽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新的制造业中心,世界经济对中国的情况同样有着巨大的依赖,而且中国的制造业产品主要是由广大的国内市场消化,不像一些小国那样主要依赖国际市场,这就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性。从内部看,中国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在发展中解决,但是从整体的动态比较和横向比较看,中国经济仍然处于最好的战略发展机遇期,有能力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从当前的经济发展看,本文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调整的谷底,正面临新一轮经济增长。由于发展阶段的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新一轮增长的速度不会有很大提升,但增长率逐年回落的现象应该会得到改变。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因素将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

第一,经过多年的经济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率逐年放慢的现象有可能得到转变,重新步入平稳增长的轨道。从图1中可以看到,1993年经济增长率到达阶段性高点(13.9%)后开始回落,经历了7年时间(1999年)又重新上升,而2010年经济增长率到达阶段性高点后,现在已经经历了8年时间,应该说调整已经比较充分。从通货膨胀程度上看,2007年和2008年分别到达4.8%和5.9%后,2009年虽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骤然下跌到-0.7%,但2010年和2011年又在当时的投资刺激政策下回升到3.3%和5.4%,没有充分得到调整,而在此之后,通胀率回落到2.6%(2012年和2013年)之下(2014年以后),低通胀已经保持了7年(参见表3)。这从价格信号上反映了当前的总量失衡是供给充分而需求偏弱。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适当的政策来扩大需求,有可能较快地见到成果。

第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下一步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好条件。1993年以后的经济调整中,面对下行的经济增长,我国不是采取需求刺激政策来保持高增长,而是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进行了包括价格体制改革、产权改革、劳动市场改革、资本市场、住宅商品化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在新的高度上建立了供需总量的相当平衡,为未来10年的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体制基础。这种改革主要是从供给和分配领域进行的,实质上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调控不同,需求侧调控更注重采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需求,从而达到平抑由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波动,而供

<sup>①</sup>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16&locations=KR-SG&name\\_desc=false&start=1986](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16&locations=KR-SG&name_desc=false&start=1986)。

供给侧改革则更具有中长期经济政策特点,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长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推进的最深刻的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对产权制度、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的调整以及准入政策、标准制订等一系列改革,使生产领域、收入分配领域中长期积累的一系列矛盾特别是结构性失衡得到了根本改善和有效缓解。

第三,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有可能对中国的消费升级和扩大消费形成推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有了很大的改善,城乡居民之间、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所减少,而脱贫攻坚战又使得贫困地区和贫困居民的收入有了显著的改善。另外,各级政府在落实全面发展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努力,社会公共事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都有很大发展,这些领域从表面上看对GDP贡献很少,但实际上确实改善了广大人民的整体福利。而随着公共服务的发展,居民家庭收入的改善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改善,在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中,就有可能有更多的部分转入消费,从而拉动整体消费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第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发展目标进行了优化,更加适应中国的国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增长或者是GDP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各级政府工作的中心。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当然有积极的意义,否则不可能创造伟大的“中国奇迹”。但是,过度重视GDP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明了在新时代应该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应该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进一步阐释了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如何对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及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出贡献。从表面上看,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似乎低了一点,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发展短板得到了较多的弥补,在全面发展上实际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全面发展从长期看更具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而经济增长也会为长期全面发展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五,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的前列。改革开放伊始,世界上正开始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在这一轮发展浪潮中我国没有再失良机,企业、研究机构和科技人员在国家的支持下或在市场竞争中抓住时机谋发展,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后来的自主创新,在包括计算机、通信、互联网、生物技术、新材料、设备制造等一系列领域中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展,新一代人才和新技术企业已经逐渐成长起来,与技术创新相关的资本市场和产业链也发展了起来。无论从生产要素条件上看还是从发展进程上看,中国目前正处于技术革命最好的发展时期,在全球的技术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这种发展既是40年来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的大国优势的体现。我国可以集中资源在关键点上取得突破,并通过一个具有14亿人口的市场和海外的市场做强做大。中国在通信技术、高铁建设、智能手机制造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进展,都和这些优势有关。这实际上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表现。

第六,宏观调控政策将为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加宽松的条件。经过多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根据这一进展,国家又适时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的融资能力,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近一两年来,国家对小微企业实施了普惠性的税收减免政策,又进一步深化了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增值税改革,大幅度降低增值税、进口税的税率,减轻企业的社保负担等,降低了广大企业尤其是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而在融资条件方面,国家在加强证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的同时,又积极推动了科创板的试点,在控制市场风险的同时,积极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在间接融资市场上,国家改善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同时通过降低存款保证金率等措施,改善商业银行尤其是地方商业银行的放款能力,增加了贷款供给。这都为新一轮高质量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从发展上看,无论是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上看,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看,国家宏观调控手段都还有很大的机动空间,可以根据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积极地进行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和较好的发展。

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中国目前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走出第四个经济周期的底部,步入新

一轮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的这几次经济周期,不断地促使我们总结经验和教训,探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因此,在每一个周期之后,中国的经济都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而不是在原有的水平上重复,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由于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了全面发展的目标以及改善了宏观调控方式,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效率更高了,优化了资源配置、有效地减少了周期性波动造成的生产力的浪费,社会经济发展也更加公平。这都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创造了更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 刘伟,2009:《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和结构演进》,经济科学出版社。  
刘伟 蔡志洲,2009:《从最终需求看我国长期经济增长》,《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刘伟 许宪春 蔡志洲,2010:《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0》,中国发展出版社。  
王金明 高铁梅,2006:《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学派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3期。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1999),商务印书馆。  
张宇,2009:《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人民日报》6月19日。  
Kitchin, J. (1923), "Cycles and trends in economic factor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1):10-16.  
Kuznets, S. (1930), *Secular Movements in Production and Prices: Their Nature and Their Bearing upon Cyclical Fluctuatio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Kondratieff, N. D. & W. F. Stolper(1935), "The long waves in economic lif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7(6):105-115.

Economic Cycle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China's Experi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1978—2018)

LIU Wei<sup>1</sup> CAI Zhizhou<sup>2</sup>

(1.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2.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also begun to experience the economic cycles brought about by the imbalance of total supply and demand in market economy. Judging from major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especially from the fluctua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inflation rate,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gone through four major cycles. Economic cycles are reflections of various contradictions in total supply and dem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While overcoming the contradictions, China has summarized historical experience, deepened economic reform, and improved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 As a result, China has been upgrading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ound after round,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process of coping with the economic cycles is also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fter entering the fourth economic cycle, China started to shift from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 far, the adjustments in all fields have become quite adequate, creating good conditions for a new round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economy is still in an important period of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With variou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can achieve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Cycle;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胡家勇)

(校对:何伟)